

**天安门抗议活动中的工人：北京工人自治联
合会的政治**

《澳大利亚华人事务杂志》

魏昂德、龚小夏

1993年1月29日（现《中国日报》）

1989年4月15日晚，胡耀邦逝世的那天，北京大学区的校园里已经掀起了政治活动。¹同一时刻，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周围，普通市民开始聚集、悼念和谈论政治——就像1976年“四五”运动时一样。²黄昏后头几个小时有数十人聚集在那里，到午夜时分，已经超过一百人。在黑暗中，一小群人在夜幕带来的匿名隐蔽下一起谈论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和工作单位的迫害。凌晨4点左右，纺织部的大约20名工人走进广场，向纪念碑底部敬献了纪念花圈。³

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十至二十名年轻工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下班后在纪念碑前会面，讨论现实的情况并决定做些什么。当他们讲述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待遇、通货膨胀对自己和朋友的影响，并诅咒中国领导人和官僚的腐败无能时，他们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和观点。到4月17日，当大学生开始在北京街头游行时⁴，工人发现，这些学生正在谴责官员的投机和腐败行为——就像他们一直在抱怨的事情一样。到1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讨论，他们开始谈论组建自己的组织，一些人主张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开展运动。他们决定在白天与同事讨论新组织的问题，并张贴了大字报，询问市民是否欢迎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

4月19日晚和20日凌晨，学生们在众多国家领导人的住所——中南海大院——的新华门入口处静坐示威。一些工人夹杂在一大群旁观者中间。抗议活动最终被挥舞皮带和棍棒的军警驱散后，有关“四·二零血案”的谣言传遍了全市。⁵其中一名工人愤怒地在英雄纪念碑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谴责军队，并发出两份传单，挑战党的领导、经济政策、谴责高层个人和家庭的腐败。这个传单是以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工自联”）的名义下达。⁶

¹ 香港明报，6月4日：中国民主运动纪事，由金江和秦周翻译（阿肯色大学出版社，费耶特维尔，1989年），第4-5页

²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此条目来自单独对活跃于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两名个人进行的一系列访谈。1990年5月和6月，两位合著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联合采访了他们。两人于1989年逃往香港。我们称之为受访者1号的人是一名百货商店职员，他以前是北京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他从4月15日开始参与这项运动，后来担任工会后勤部主任。面试时他住在加拿大。受访者2号曾是北京的工厂工人，后来在该市开了一家私人服装店。5月中旬，她作为天安门广场工会公共广播系统的广播员活跃在工会中。

³ 第二天晚上，即4月16日星期日，当来自北京大学的300名学生走进广场并敬献8个花圈时，学生们首先游行到纪念碑前。明报，6月4日，第4-5页；托尼·赛奇，《北京人民运动的兴衰》，《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第24期（1990年7月），第186页

⁴ 当天，3000名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到广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明报，6月4日，第4-5页

⁵ 赛希，《北京人民运动》，第186页，明报6月4日，第7-9页。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小、暴力程度较低的对抗。

⁶ 小组使用几个不同版本的名称，有时在同一天签发的文件上。4月20日的文件以北京市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发行，后来的名称包括北京工人自治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和北京市工人自治会。5月底，他们开始使用“首都”，而不是北京，来识别自己，他们在文件上签署为首都工人自治会，首都工人自治联合。在流行演讲中，该组织被简单地称为工人联合会，或工自联。

因此，在5月19日宣布戒严前不久，一个在民主运动中，外在作用甚微的组织诞生了——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直到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三名成员举行抗议活动一案，才引起媒体的关注。⁷在6月4日大屠杀前一周的高峰期，联合会动员了约150名积极分子在广场上连续工作。它发出大罢工的呼吁，但由于联合会在工作场所没有有组织的分支机构，这些呼吁基本上无人理会。在6月的流血和逮捕中，该组织的成员人数锐减。从十年前波兰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工自联的政治意义似乎确实有限。

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撰写的一份评估中，我们注意到，工自联“与其说是动乱的原因，不如说是动乱的结果”，工人运动利用了学生运动所创造的政治空间、政府的派系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机构瘫痪。⁸

经过更持续的研究，上述评估似乎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低估了工自联的重要性。首先，该组织在宣布戒严后动员街头抗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随着5月最后几天学生在广场上人数的减少，工自联的成员越来越多，其组织达到了高度戒备状态，在组织对抗戒严方面也采取了高调。此外，虽然工自联在工作场所缺乏正式组织的分支机构，但它与全市的工人和工作单位有着许多重要的非正式联系，在枪声响起之前，它从这些部门获得了稳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与学生运动不同的是，工人运动在戒严后势头有所增强，从5月到6月，工人运动似乎获得了更多信心和力量。

然而，更长远的意义不在于其规模、组织或活动，而在于其成员的心态和政治取向。工自联代表着人民共和国新一种政治抗议的出现。它不符合文化大革命或七十年代中期工人激进主义的模式：不同派系政治领导人动员当地追随者进行政治斗争。⁹也不符合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公民、学生与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的传统智力反抗模式：例如，受过良好教育在职青年作为相对识字的散文家，领导了1974年在广州举行的李一哲抗议活动或1978-79年在北京举行的民主墙运动。¹⁰工自联的工人是相当普通的劳动人民，往往头脑敏锐，能说会道，但教育和写作能力有限（正如他们的大字报所表明的）。他们表现出一种反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这种反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但这次是以建立工人阶级工会为形式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这种态度从他们4月中旬的第一次声明中就很明显了，在与精英和陷入自恋的学生运动关系逐渐紧张恶化的过程中，这种态度得到了加强和进一步发展。工自联对党、党的改革者、八十年代的改革，甚至对学生运动的态度，都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广为人知的观点大相径庭，在许多方面都自觉地反对。这种态度在中国劳动人民中普遍存在，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在中国不确定的政治前途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这篇

⁷ 见《华盛顿邮报》5月31日，《纽约时报》5月31日，《中国日报》5月30日、5月31日和6月1日报道

⁸ 见魏昂德《1989年北京剧变的政治社会学》，《共产主义问题》，第38卷，第5卷（1989年9月至10月），第30-40页

⁹ 例如，Keith Forster 叛乱和派系主义：浙江，1966-1976年（夏普，阿蒙克，纽约，1990年）

¹⁰ 安德鲁·内森在《中国民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6年）中揭露了这些共同的假设，他在其他地方争辩说，学生们并没有果断地背离1989年的抗议传统：1989年的中国民主：连续性和变革，共产主义问题，第38卷，第5卷（1989年9月至10月），第16-29页。

文章中，我们将从两部分叙述工自联。一是它作为一个组织的发展和活动的故事；二是一种独特而新颖政治心态的出现和阐明。

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组建独立工会的决定，起源于新华门学生被殴打引起的愤怒。前几天，在广场上参加晚间讨论的二十多名与会者发现，各自单位的工人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非常不满，特别是对通货膨胀和单位领导的态度，¹¹他们对于一个能真正代表他们的组织非常感兴趣。4月20日，当几位工人在纪念碑前发言时，他们不仅对当局的行为感到愤怒，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特权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当时学生运动仍然主要限于悼念胡耀邦。当天发言的几位工人抨击了官方工会，并谴责通货膨胀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分发的一份传单中，工自联将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下降和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归咎于“独裁官僚的长期统治”。传单继续说，“统治者因为要维护他们少数人的挥霍，大量地发行了各种债券，如国库券，金融券，把人民仅有的收入据为己有”。¹²工人们在传单上提出稳定物价和公布高级官员及其家属财产收支的要求。¹³

愤怒的工人在第二封传单里向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主题是谴责高官的特权奢靡生活：工人们问邓小平的一个儿子在香港跑马赛道上赌了多少钱；赵紫阳打高尔夫球花了多少钱；政治领导人究竟拥有多少栋价格不菲的别墅；高级官员的个人收支是多少。工人们还希望解释党的领导如何看待经济改革的“弊端”，以及为什么提出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似乎从未奏效。他们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债务表示担忧，询问这相当于人均债务多少，以及偿还债务将如何影响未来几年的生活水平。¹⁴

4月20日纪念碑上的传单和骚动吸引了数十名工人加入新生的运动，其中一些人，尤其是韩东方，当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发表演讲，随后在该组织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积极分子宣布，有意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今后应每天在天安门西观礼台开会，该组织确实在那里形成，一直待到5月底。尽管他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到七八十人左右，但积极分子仍然觉得在演讲中自称是“工自联”，或高举印有这个名字的横幅，风险太大了。事实上，广场上的积极分子，要么单独前来要么来

¹¹ 受访者1号解释说，此时有部队驻扎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几个地方，武警部队在新华门实施暴力。

¹² 这指的是用国库券支付工人工资的做法，只有在几年后才能赎回，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10月都会进行这种强制债券销售。

¹³ 1989年4月20日，北京市工人联合会，告全市人民书，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精选》（十月评论社，香港，1989年），第1页，第27页。

¹⁴ 1989年4月20日，北京市工人联合会，十问书，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27页，受访者1号坚持认为，“致全市人民的信”实际上是在19日编写的，尽管它的日期和发行日期与十问书相同。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党的领导在有争议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到的指责学生“以工人的名义印刷”企图煽动“混乱”的“反革命传单”。我们采访的积极分子报告说，许多人对社论的假设感到愤怒，即工人们不能自己写作或说话。

自同一工作单位三两成群，在五月中旬之前感到非常不安全，他们默契地只以姓氏为基础区分身份。¹⁵

他们都是政治异见活动的新手，在领导一个组织方面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或经验。他们试图到各种大型工厂（并不总是自己的工厂）和最活跃的大学校园去建立联系，收集信息、建议和想法。¹⁶

和许多普通北京市民一样，他们还帮助学生在4月27日和5月4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清扫道路，并提供参与者食物和饮料。直到5月13日学生绝食者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导致广场上数十万学生和围观者继续占领，士兵和交警撤出市中心，他们才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揭开横幅，宣布他们的存在和目标。

他们建立了一个扬声器系统，最初有几个扩音机，但在一周后的戒严前夕，他们开始使用麦克风和大型公共扬声器。在西观礼台底部的墙上，在旁边的售票亭上，他们张贴了组织声明和捐款请求，并搭建了临时帐篷。从此，他们开始建立松散的领导安排和组织结构，以划分任务。¹⁷

5月13日至20日这一周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来自全市工厂和其他工作单位的大批工人首次表明他们大声支持新兴的民主运动。工自联在每一次示威游行中都走在显眼的位置，驾驶着几辆应大字报要求借给他们的车辆，并在该市许多国有工作单位的代表团旗帜旁展示他们的旗帜。¹⁸大批在这些游行队伍中游行的工人随后来到西观礼台，与新生的工会取得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并成为积极分子，还有更多的人前来询问、提供鼓励和建议，或自愿与自己的工作单位联络，或帮助组织对工会活动的物质支持。随着核心积极分子现在激增到150人左右，并大胆地在大型街头游行期间和之后获得支持，工自联决定尝试建设自己为一个合法组织。

成员们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室求助，尽管官方工会公开支持广场上的学生，但拒绝帮助工自联。他们去了市政府办公室，但被拦在门口，被判定为非法组织而拒绝。他们去北京市公安局登记，被作为麻烦制造者赶走。¹⁹无法获得官方承认，

¹⁵ 受访者1号解释说，他们避免被询问名字和工作场所，因为担心这会使他们的身份和动机受到怀疑。

¹⁶ 在此期间，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工人张贴的一匿名大字报可能是其中一名积极分子所为，它建议学生呼吁工人，放弃要求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增加教育预算这类对“不切实际的民主变革”的要求，转而提出关于生活水平和特权的口号，这实际上是4月20日两次“工自联”言论的转述。1989年4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人致学生的公开信”，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1号，第33页。一位学生的回忆录提到了4月底一名工人与北京大学学生组织联系的努力，见沈童，几乎是一场革命（霍顿·米夫林，波士顿，1990年），第185页，204页，218-19页。

¹⁷ 魏昂德受访者1号和2号的采访。

¹⁸ 已出版了几张示威照片，严云祥给我们看了一张他拍的照片，照片中，一家大型石化厂的代表与工自联同用一辆卡车。

¹⁹ 受访者1号和2号的采访。

组织仍毫不畏惧地正式宣布成立。5月18日大规模示威后，广场上一大群人中间，一位工自联的领导人举起扩音器，宣布工会正式就职。第二天，随着关于即将实行戒严的谣言流传开来，工自联匆忙地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公告，最后说：“同时我们将向全国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²⁰

绝食的一周也出现了工自联的明显升级。在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寻求加强党内温和派和改革派支持之际，工自联对“运动”的定义大相径庭。甚至在戒严之前，工自联就瞄准了党作为攻击目标。在5月17日发表的一份非常煽动性的文件中，工自联宣称，“官的横行到了极点！官吏的残暴到了极点！大陆之大，已经没有真理的一席之地了！任何反动势力也阻碍不了全国人民愤怒的洪流，人民不会再相信当局骗人的鬼话。”这使人想起党在四二六社论里将工自联的前两个传单描述为反革命，最新的传单要求收回、谴责社论及其后台（指邓小平），并问道，“既然不敢在报纸上公开回答我们的十个问题，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两份文件全部刊登在你们的报纸上；难道你们连这点胆子也没有吗？你们不是喊了四十年的相信广大群众的口号吗？”

文件效仿了文革期间造反派的出版物，详细谴责了官僚特权：子女、配偶和保姆出国旅游，高级官员包养情妇，并宣称“我们认真核实了对工人的剥削账。剥削方法是按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的分析法。们吃惊地发现：‘人民公仆’们侵吞了人民尽血汗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根据这一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文件随后宣布，只有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过去40年的政治运动相当于镇压人民的政治手段。历史已经表明，他们（即共产党人）喜欢“秋后算账”，但历史不容篡改。这份文件最后警告高层各政治派别不要试图利用人民运动为自己谋利，邓小平利用（1976年）四五运动成为党的领导人，但之后他暴露了自己是一个暴君。随后的改革是肤浅和虚假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而沉重的外债等待人民偿还。²¹

另一份大约同时发行的传单也包含类似的对抗性言论，实际上，它要求工人为了下一代而牺牲自己：中国统治者四十年来，也许是几千年来，使群众一直处于屈从状态，剥夺了一切权利，任何敢于抗议的人都被杀头。文件指出，敢于参与独立政治活动的工人会受到严厉制裁，随后宣布：“啊，中国人！这样一个可爱但又可怜又悲惨的人。我们被骗了几千年，今天还在被骗。不！相反，我们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应该恢复我们原来的伟大！工人兄弟，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把这种屈辱带入21世纪，那么最好在20世纪的战场上死去！工友们，暴政并不可怕；（相反对暴政来说）可怕的是暴政下的叛乱。”²²对抗性言论伴随着警告和最后通牒：5月19日的文件要求在24小时内接受学生绝食者的要求，或要求在5月20日举行为期一天的大罢工，并在当时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²³工自联还宣布，它将于5月22日组织一次大游行，使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²⁰ 1989年5月19日，首都工人宣言，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1号，第29页。

²¹ 1989年5月17日，致全体同胞的信，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1号，第28页。

²² 5月中旬，告全国工人书，传单未注明日期，在北京路口分发，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2号，第43页。

²³ 首都工人宣言

5月19日午夜后不久宣布戒严，彻底改变了该市的政治活动模式。从5月20日凌晨全市手无寸铁的市民成功阻截负责封城的武装部队开始，随后，对政府的大规模抵抗突然成为现实。到20日白天，工自联再次呼吁举行大罢工（不包括基本服务、通讯和运输），在部队撤离之前保持有效。²⁵工人组织所阐明的好战立场，以及该组织前一周在广场上发展起来的组织，将其推入街头正在展开的事件中心。与此同时，民众对戒严的愤慨迫使许多新成员加入新宣布的工人组织，扩大了其队伍。5月20日，工自联在广场上开始了公开登记活动。空白识别卡是从文具店购买的，会员卡发给那些同时出示工作单位和北京居民身份证的人。尽管会员记录存在明显的危险，但到6月3日，工自联声称已注册了近20000名会员。²⁶

这一周工自联的程序和领导结构逐渐清晰时，一个松散的筹委会和后来建立的常委会，在没有任何指定的正式办事处的情况下，出现来领导这项运动。然而，在这种松散和协商自愿的结构中，韩东方非正式地成为主要领导人和代言人，分别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²⁷设立联络工作办公室，与各大工厂、活跃的大学校园和其他工人和公民团体保持沟通。到5月底，工自联颁布了一项计划和章程，设立了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²⁸它现在有一台印刷机，在广场上发行更专业的传单，还在崇文区经营一家印刷店。²⁹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以维持附近的秩序，并在必要时保护学生；成立了四个敢死队，协助阻止任何警察或军事行动。

宣传部重组了广播业务，使之成为工自联在广场活动上或许最重要的方面。节目编制进行了改进，设备进行了升级。到五月底，它从早到晚连续播出。几位广播专家，没有一个是业余的工人，因他们的声音和措辞而被征召入伍。³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的新闻被现场转播，还向听众宣读杨尚昆敦促军事解决的讲话等“内部”材料。然而，工作时间之后，广播变成了一种民主论坛。政治声明和讽刺歌曲、诗歌被写下来，由观众转交，供群众宣读。事实证明，这是该组织最受欢迎的活动，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普通工人、心怀不满的记者和

²⁴ 告全国同胞书

²⁵ 北京市总工会筹备办公室公告（第1号），传单日期为1989年5月20日，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1号，第29页。

²⁶ 两名受访者给出了相同的数字。受访者1号是登记新成员的人之一，受访者2号报道说，当军队向广场开枪时，一部分工自联卷宗被帐篷里的领导人烧毁。几天后，她搬走了剩下的，并销毁了它们，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成员的登记似乎在4月下旬悄然开始，根据一种说法，到5月2日，约有2000名成员登记。见《工人崛起：工人自治联合会运动1989》（香港，1990年），第32页。本书的英文版亦已出版：《真理时刻》香港亚洲监测资源中心，1990年。

²⁷ 受访者1号是负责后勤工作的人之一。1989年5月21日，《北京市总工会公告》简要地描述了新结构。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1号，第29页。

²⁸ 首都工人自治工会临时章程，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2号，第42页。

²⁹ 印刷业务由一对老年夫妇经营，他们经营着一家小型私人作坊，在工自联事业中担任志愿者，发挥了非同寻常的积极作用。由于未察觉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这对老夫妇继续发放传单和大字报，直到6月9日被捕。见《工人起来了》，第283页

³⁰ 某私营企业家以这种方式参与了这项运动，两名女学生也被征召为广播员，是参与该组织的极少数妇女之一。

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心怀不满的干部和官兵，都向广播站投稿，内容常常是官方的欺诈或不当行为，每晚都会向广大观众宣读。

从5月20日开始，工自联几乎每天都组织自己的示威活动，并协助为抗议戒严而举行的最大规模示威。³¹该组织指责市政府试图煽动“动乱”，并呼吁该市所有工作单位组织在戒严期间维持秩序，以避免官方动用任何武力借口。³²在这项工作过程中，工自联与其他公民组织以及包括官员在内的大型国家工作单位的成员建立了广泛的接触。建立联系、保持联络的团体有正在组织自己联合会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³³，即将成立行业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建筑工人³⁴，首都工人纠察队³⁵，飞虎队摩托车旅³⁶，北京市民敢死队³⁷，来自东北的两个工人组织³⁸。与占据广场的学生组织的联系变得更加频繁，尽管紧张关系不亚于以前（请参阅下文了解更多有关内容）。与代表团仍在广场上游行的工厂成员也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是北京焦化厂，据报道，北京焦化厂厂长领导了一次游行。来自国有工厂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老工人、车间干部和工会人员在总部和广播电台四处游走，口头和书面地提供建议和鼓励。³⁹

在整个戒严期间，工自联在传单中保持了与绝食期间相同的语气，这种言辞将工人阶级斗争的想法与民主反对寡头政治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在5月26日向所有海外华人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工自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基和柱子沾满了我们的鲜血和汗水，我们的国家是由我们工人和所有其他精神和体力劳动者的斗争和劳动创造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合法主人，我们确实应该在国家事务中听取意见，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一小撮堕落的民族和工人阶级的败类篡夺我们的名字，

³¹ 例如，工自联帮助组织了5月25日举行的最大一次反对戒严的示威活动，该组织在前一天发放了一张传单，通知工作单位的人们何时何地集会，以及他们的横幅上写着什么标语。他们宣布，一辆印有工自联横幅的宣传车，随后是工人纠察队的成员，将带领游行队伍绕行二环至天安门广场。见1989年5月24日紧急呼吁，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1号，第31页。另见明报，六月四日，第117页。1989年5月27日，《工人，动员起来》中也包括了一套类似的指示。

³² 见《紧急呼吁》

³³ 受访者1号，游行队伍在示威游行中的照片发表在《工人起来了》上，第46页。

³⁴ 1989年5月21日城建工人自发联合会宗旨，转载于《中国民运原资料》，第1号，第32页，受访者1号报道说，工会最初由工自联的一部分成立。

³⁵ 这是北京市民在广场上为维持秩序和保护学生绝食者而成立的一个单独组织，宣布成立和宗旨的大字报表示，它是由中国劳工运动研究所教职员组成的支持学生活动委员会组织的，致首都工人书，大字报未注明日期，但内容确定日期为1989年5月13日。

³⁶ 受访者1号和2号报告说，这一群体主要由私营企业家组成，但并非完全由私营企业家组成，而且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或计划。他们在街头巡逻和传递新闻和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戒严之后，在许多报道中都有描述，而且他们的照片很常见。他们有大约300名成员。见李云等人，《蛇年动荡的夏天》，第189-93页。

³⁷ 成立于5月25日，当时民众抵制戒严，显然未能改变政府的强硬立场。明报6月4日，第117页，Saich，“北京人民运动”。

³⁸ 受访者1号报告的东北虎敢死队和长白山敢死队。

³⁹ 受访者1号声称，由于大多数工自联成员的青年缺乏经验，他们严重依赖经验更丰富的工厂人员，因不愿冒直接参与的风险他们向工自联提供战术和组织方法方面的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干部（后来在香港接受采访）估计，该组织一半的员工支持这项运动，他们先上街支持学生，然后支持工自联，他们经常接触，甚至提供广场上广播的文章。见《工人起来了》，第99-111页，特别是第102-107页

压制学生，谋杀民主，践踏人权！⁴⁰同日发行的另一份传单将这场运动比作法法国大革命，此时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即将来临，并敦促工人“攻克 80 年代的巴士底狱”。文件宣称“决战的时刻到了”“已经遭到亿万人民唾弃的法西斯政府及其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制度，并没有，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李鹏及其后台和一小撮顽固不仁的追随者还在歇斯底里地表演，他们完全有可能再做一次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这份文件以现在熟悉的风格，呼吁所有人准备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做出巨大牺牲，以完成反对斯大林式独裁统治的残余，在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下像真正的人类一样生活：“向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巴士底狱及全世界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堡垒，进行空前波澜壮阔，激烈悲壮的最后抗争。”⁴¹三天后，他们宣布，各民众团结起来，为救中国，为救人民，快把大独裁者邓小平推下历史的舞台。⁴²

随着信心日益增强，工自联，一个直到 5 月中旬才公开宣布其存在的组织，其成员直到 5 月底才向对方透露他们的全名，两次与安全部队对峙。首先，5 月 28 日，一个学生纠察队的成员跑到工自联总部报告说，一些学生在大兴县郊区的一个村庄遭到殴打和逮捕。他们请求工自联增援，一起要求释放学生。工自联派了一支使用借来卡车的纠察队，在他们面前是一群来自飞虎队的摩托车手，在他们身后还有五辆满载支持者的卡车，这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峙的一幕，造反派大量前往县委总部，要求释放战友。当地官员拒绝承认曾逮捕过任何人，但救援队后来得知囚犯藏在哪里，赶到那里，释放了 8 名学生。他们对官员的谎言感到愤怒，在出城的路上被当地公安局拦住，大声反对并用石头投掷公安大楼。⁴³

5 月 30 日和 31 日与安全部队的第二次对抗，使工自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外国媒体的聚光灯下的焦点。29 日晚，总部周围的积极分子注意到他们正受到便衣警察的监视。5 月 30 日凌晨 1 点左右，工自联领导人之一沈银汉被公安民警强制带进北京饭店门前的公安吉普车。当他被推上吉普车时，他大声呼喊，把笔记本扔在地上。他的喊叫引起围观者的注意，他们找回了笔记本，把它带回了长安大道的工自联总部。工自联在广播和匆忙打印的传单上谴责了这次逮捕，呼吁在北京市公安局于当天中午举行示威游行。⁴⁴后来发现，联合会领导层的另外两名成员以及飞虎队摩托车旅的 11 名成员也被逮捕。这些逮捕似乎是两天前大兴县对峙引起的。

当天上午 10 时 40 分，韩东方率领一个由约 30 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公安局办公室。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的陪同下，他在门口会见了公安局的代表。谈判一无所获，公安局代表坚持认为，工自联是一个非法组织，无论如何，他只会与学生谈判，此外，他拒绝承认曾逮捕过任何人。⁴⁵当他们走出大门时，一大群市民和学生已经聚集起来。韩东方拿起扩音器，在几千名群众面前，就宪法和不法

⁴⁰ 1989 年 5 月 26 日，《告海外同胞书》

⁴¹ 1989 年 5 月 26 日《紧急动员》

⁴² 1989 年 5 月 29 日《人民号令》

⁴³ 受访者 1 号参加了此次行动

⁴⁴ 1989 年 5 月 30 日《紧急通知》

⁴⁵ 1989 年 5 月 30 日《紧急通知》

行为发表了演讲，并谴责了逮捕行动。⁴⁶一群警察摄影师出来开始调查、记录人群。人们留下来高呼口号，唱着《便衣警察》的主题曲，这是一部关于镇压 1976 年天安门抗议活动的热门电影。其中一个难忘的场景是，一位肥胖超重的干部从大楼里出来，大声斥责工人：“你知道啥法律？我就是法律！”在现场的外国新闻工作者拍摄了这次活动的照片和录像带。当一名日本记者冲上前去拍摄对峙时，干部打了他一耳光。当记者抗议“我是日本人！”时干部迅速拉手道歉，“我以为你是中国人。”⁴⁷

工自联迅速发出传单，向公众通报谈判陷入僵局⁴⁸，晚 9 时 30 分，工自联为外国媒体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在公安部办公室组织了静坐示威，广场上还安排了更多的抗议活动，包括学生。也许是为了回应这些顽固的抗议和全世界媒体对这场冲突中被捕工人赢得的关注，他们于 31 日下午获释。当三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逮捕行动时，韩东方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宣布了这一消息。⁴⁹

在 30 日和 31 日逮捕引起的对峙之后，公安局开始对西观礼台的工自联总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关于军事解决方案即将出台的传言不断，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人数正在迅速减少。尤其是来自北京的学生，他们正返回校园或回家。安全形势迫使剩下的顽固派学生和市民团结在一起。学生领袖们终于放弃了他们长期坚持和引发不满的争议性方针，即为了让民主运动保持“纯洁性”而要求工人们远离广场的主体部分。6 月 3 日，当外围路口发生屠杀的消息开始传到广场时，大多数工自联成员冲了出来抵抗军队推进，而剩下的大多数学生则更紧密地挤在纪念碑周围，等待他们预期的殉难。

工自联的政治心态

工自联政治心态的特殊主要是因为领导班子和委员几乎都是普通青年工人，几乎没有什么高级教育和运动的经验。⁵⁰他们从钢厂、铁路厂、机械制造厂和建筑公司来到广场（见下表），并不像政府后来宣称的那样，他们不是失业工人或北京流民，正如已经观察到的，所有登记者必须出示在北京一家单位的工作证。⁵¹该组织的领导人最多接受高中教育，他们往往不得不依靠几位具有大学背景的“顾问”帮助他们起草宣言。⁵²这些人不认为自己是精英政治游戏的参与者，他们不

⁴⁶ 见明报第 127 页

⁴⁷ 受访者 2 号

⁴⁸ 《紧急通知》

⁴⁹ 明报第 127 页

⁵⁰ 据我所知，唯一的例外是，受访者 1 号参与了 1985 年北京公共汽车公司著名的减速罢工。

⁵¹ 工自联事实上的领袖韩东方似乎是一个工人，他的铁路厂领导看好他，戒严前夕，他单位的党委书记和车间经理、其他一些干部一起来到工自联总部，试图说服他回来，并承诺保护他免于被捕。受访者 1 号目睹了这次相遇。在 5 月份在广场上进行的一次采访中，韩说，他在军队期间是一名政治活动者，曾获得“先进个人”奖，见《工人起来了》第 146-51 页。

⁵² 主要的例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李学金，他担任“法律顾问”，帮助起草许多较长的公告；何丽丽，北京市机械制造局职工学院讲师，领导委员会成员；周永军，北京政法大学学生，早年领导北京学生会联合会，在吾尔开希、柴玲等领导崛起之前，他曾领导过北京学生会联合会。明报第 32 页，第 47 页，沈童

仅表现出与政治制度的尖锐疏远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与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的疏远感。

图表 工自联积极分子与领袖的背景

受访者 1 号，26 岁，高中毕业生，西单百货公司销售员，常委会委员兼后勤

受访者 2 号，29 岁，高中毕业生，私人服装摊主，广播员

白东平，28 岁，高中毕业，北京铁路局永定门段铁路搬运工

韩东方，26 岁，北京铁路局丰台铁路站工人，常委会委员

贺力力，36 岁，北京市机械制造局职工学院讲师，常委会委员

景刚，工人

李江，工人

李进进，33 岁，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顾问

刘焕文，27 岁，高中毕业，首都钢铁公司特种钢厂冷轧厂一号工人，纠察队队长

刘强，28 岁，高中毕业，北京工厂印刷车间 3209 号工人，常委会委员

刘翔，21 岁，工人

刘子厚，工人，北京货运运输公司工人，纠察大队大队长

钱玉民，28 岁，高中毕业，北京铁路局工人，常委会委员兼秘书

沈亚青，建筑工人

沈银汉，工人，常委会委员

田伯民，工人

王登岳，宣武区建设公司工人，筹委会委员

肖德龙，清华大学厨师

严福甘，工人

岳武，山西省工厂工人干部

赵平禄，丰台起重机厂工人

周永军，大学生，北京政法大学，常委会委员、宣传部部长

数据来源：《工人起来了》，《中国之春》1990 年 1 月刊，P31-32；北京市公安局 1990 年 3 月 27 日至 31 日对钱玉民，白东平，刘强，李进进和刘焕文的讯问笔录，张振海劫机案中提交给日本法院记录（新华社 1989 年 12 月 16 日）

（张振海宣称他曾经参与八九民运，要求政治避难，但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振海是否与八九民运有任何关）

从最早的声明开始，工自联就十分关注面包和黄油的经济问题，其政治改革的要求总是能够使工人在未来更有效地追求他们的权益。他们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评价远不如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把改革时代描绘成工人阶级成为牺牲品和经济管

《几乎是一场革命》第 190、202、208、219、221、249 页，在 5 月的最后一周他来到工自联，带来了一大笔已经捐给他控制下学生组织的钱，在该组织成立的最后几天，他参加了核心小组。

理一贯混乱的时代。工自联表现与改革派知识分子明显疏远，对精英改革者利用他们作为政治炮灰非常警惕。此外，即使在赵紫阳下台后，工自联也一直对赵紫阳持批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导致与学生在运动定义和战术方面大不相同，关系日益紧张。5月份，工人们广场上精英学生的蔑视加深了，通过各种接触和观察，他们开始定义自己的身份和计划，学生则是一种反面教材。这种政治心态的所有特征，都明显背离了中国最近的政治异见传统，正是因为它很好地反映了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政治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以精英为中心的政治异见传统中很少表现出来。

虽然学生运动确实承认工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和官员腐败，但这些问题只是工人关注的开始。从最早的声明，工自联要求稳定物价，随后继续坚持，并发展了对深层次政治性系统性通货膨胀的批评。⁵³除了关于强制出售国库券或调查上述官方收入和特权的要求外，工自联还提出了若干其他关切，例如自由更换工作的权利和在工厂雇佣中结束对妇女的歧视。⁵⁴

然而，工人更关心的是确立他们为工人利益而战的权利，而不是提出具体要求。在5月份的大多数书面声明中，工自联宣称，它正在进行一场“争取民主”和“推翻独裁”的斗争，其成立是为了“正确领导民主爱国运动”。⁵⁵具体来说，工自联对“民主”的解释非常清楚。正如其一名成员所解释的，与临时章程的措辞相呼应，“工人们希望建立能够在谈判中切实代表他们的、真正的民主。全国总工会根本没有为谋求工人的利益付出过努力，这个组织不配成为工人口中‘属于自己的工会’。”⁵⁶工自联宣称，它的存在“不应当仅仅是个福利组织，根据大多数工人的意愿，提出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此外，工自联还声称有权“监督共产党”，“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监督其法人代表，保证工人真正做企业的主人；在企业中通过与企业主谈判或其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权益。”⁵⁷

正如一位工自联活跃分子所解释的，这种民主定义可能立即对普通工人产生吸引力：

为什么很多工人都同意民主和自由？……在车间里面，是工人说的话管用，还是领导说的话管用？我们后来聊过这个。在工厂里面，厂长就是独裁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从工厂出发看这个国家，就能发现其实是一回事：一人专制。我们的目标并不高，就是希望工人能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例如，如果我想换工作，公共汽车公司的工头不会让我走。我应该5点回家，但他告诉我加班两个小时，如果我不加班，他会削减我的奖金。这是一人专制。工厂应该有一个体系。如果一个工人想换工作，他们应该有一个规则体系来决定如何去做。此外，这些规则应该由每个人一起决定，然后任何违反规则的人将按照规则受到惩罚。这是法治。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法律制度了。

⁵³ 4月20日《告全市人民书》

⁵⁴ 《告全市人民书》

⁵⁵ 5月20日和21日传单

⁵⁶ 受访者1号

⁵⁷ 5月25日传单

在激进的政治言论的背后，是要求工作场所代表权、集体谈判和公正执行工作规章的直接要求。

对经济改革的评论

以改革为主题，工自联对中国领导人表现出最强烈的情感和最大的蔑视。这可能会让外国观察家感到意外，他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通过中国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提供的镜头看到了改革的显著成就。尽管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但工自联将改革时代描绘成经济管理不善和官场欺诈的时代，在此期间，工人相对于其他人收获甚微，而他们的生计却变得不那么安稳。⁵⁸

正如《工自联声明》所描绘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国家，“内外债累累，人民税收重重，物价飞涨，逾十亿人民的中国在世界上名列尾后。”⁵⁹ 一种讽刺韵律，在运动中非常流行，几乎可以肯定，在工自联广播站上读了几遍，由组织印刷和分发。它描述了邓小平改革下的中国（我们只是象征性的尝试，使翻译押韵）：⁶⁰

三中全会开，号召富得快，百姓的口袋没见鼓，黑猫白猫肥起来。
对外要开放，投资引进来，外债欠了一屁股，却把私款存起来。
钞票加时赛，国库券上短平快，副食补贴七毫五，物价却比火箭快。
改革形势好，政策也不坏，大鼻子没入中国籍，炎黄子孙往外跑。
宾馆酒店多，面貌换时代，鹤立鸡群威风大，市民少住宅，好的经验吸收慢，茅房收钱学得快。
贪大求洋不务实，国财理不开，教育经费出不起，吃喝之风全上台，国运家运加恶运，皆因上层太腐败。⁶¹

中国的所有问题似乎都是由于中国的改革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尽管如此，他（邓）控制言论自由，宣扬什么我国的总产、总收入等接近或超过别国，可殊不知别国的人口才有几个，而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别的国家的几分之一。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十亿人如此贫穷，如此落后呢？难道是我们无能吗？几年来，官僚越来越腐败，领导无力解决，究竟是何原因？中国地大物博，人力资源丰富，你们却把中国搞的一塌糊涂。说什么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就带着十亿人摸着石头过河。这么多人摸石头，摸了这么十几年，走的路又如何呢？难免有很多摸不着石头的人，岂不就被河水淹死了？改革十多年来，没有方向，没有

⁵⁸ 为了调和客观衡量经济发展与工人对生活水平停滞的看法之间的差距，请参见《工人、经理和国家：1989 年的改革时代和政治危机》，《中国季刊》，第 127 期（1991 年 9 月），第 467-492 页。

⁵⁹ 5 月 26 日《人民号令》

⁶⁰ 5 月 26 日《中国现状十大怪》

⁶¹ 5 月 26 日《中国现状十大怪》

目标，到底十亿人奔向何处去？既造成混乱，又造成矛盾，分化越来越深，其必导致官猫越吃越肥，民猫越来越贫，难道这是治国良方吗？

在与工自联成员的访谈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该组织的积极分子评估改革的方式。后勤部前负责人认为，改革尚未全面展开，因此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工人。

改革是不成功的，是没有结果的改革。他们改革改到一半就踩了刹车。改革的一个好处是，它让工人、农民和其他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工会是什么样的……改革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很多事情。我们不像以前那么笨了，慢慢地我们不再唯厂长命是从了……人们回忆起毛泽东的时代，那时的东西并不贵。我认为，如果邓小平年轻二三十岁，改革也许可以做得更好。改革后，我们有冰箱；但是看看我们要在里面放些什么？……冰箱都是用贷款买的……在城市里，他们解雇你，送你回家，只发3个月的生活费，仍然希望你感谢党……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们想到的是国民党。在这场运动之前，我们常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国民党，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糟糕。共产党如此好以至于我们吃不饱。当然，我们在街上不敢这样说话的，只是在我们自己家里，当我们一起喝酒发牢骚的时候（受访者1号）。

经过一番调研，我们的工自联受访者承认，尽管近年来通货膨胀严重，但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没有下降。但近年来，改革者对经济将继续改善的预期因通货膨胀而破灭。最让他们恼火的是，随着80年代后半段工人改革的深入恶化，干部们不断中饱私囊。

改革开放后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成了那些有权有钱人的天下，但那些普通老百姓却有可能遭灾遭难，还没什么受益的机会。甚至我奶奶也说，那些当官的，或者有子女当官的人能吃上皇粮有国家兜底，根本不用担心养老，而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能指望自己的儿女。现在我们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孩子。要是你生育年龄到了却患不孕不育症，那该咋办？所以改革开放之后，那些会走后门的、手里有特权的人就赚的盆满钵满。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公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人们觉得同样都是努力工作，凭什么那些手握权力的人能变得更富裕？（受访者1号）。

对工自联的积极分子，甚至对许多普通工人来说，改革停滞不前，工人前景黯淡，官僚继续变得富足绝不是偶然的。在关于经济改革的宣言中，工自联的工人阐明了一个民间通货膨胀理论，将物价上涨、政治独裁和官员腐败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综合体。在这些工人看来，通货膨胀不像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双轨制价格体系或自由市场规模不足的结果，而是直接由统治中国的无能、腐败、自私的独裁者导致的。⁶²

这不是工自联积极分子在参加民主运动一段时间后才达到的立场。该组织在第一张传单的第一行就写道，“由于独裁官僚机构的长期控制，通货膨胀已经失控，

⁶² 在最近对1989年以后离开中国但民主运动期间不活跃的工人的访谈中（见魏昂德引用的“工人、经理和国家”访谈），我们发现证据表明，这一民间理论非常广泛。

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⁶³ 工自联受访者向我们解释，像钢铁和机器，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都是以高价出售的，因为官员们要求更高的价格，他们因此而拿到回扣。在对外贸易中，受访者似乎相信进口材料助长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因为高层官员的子女利用父亲的权力获得垄断地位，以哄抬国内市场高价牟利。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权力寻租，腐败渗透到国内原材料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所有项目中。这就是工自联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即所谓的“受害的是国家，得利益的是一小撮，还债的是广大人民。”⁶⁴

这种民间的通货膨胀理论可能有助于解开一些人在民主运动中观察到的一个谜题，为什么工人阶级，其主要关注点是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和可支配收入，却对学生运动的反应如此同情，而学生运动对政府的主要指控是腐败和缺乏民主。

与党内改革者的疏远

鉴于上述观点，工自联在国家领导层中没有任何崇拜的对象——除了一个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胡耀邦几乎从未在传单中提及过，但我们的受访者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胡耀邦确实受到尊敬，并受到普通民众的真诚哀悼。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胡耀邦在 80 年代平反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是因为众所周知，他是现任领导人中的一员，却比毛泽东更关心老百姓，走遍全国，特别是到灾区和贫困地区。对胡耀邦的崇敬使我们感到震惊，联想到追溯性神话和怀旧造神运动的产生，当他成为许多官场缺乏的美德象征时，他的传奇也逐渐成长存续下去。

赵紫阳和邓小平受到的尊敬要少得多。事实上，他们和整个改革派被认为并不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好：

工自联活跃的时候，我们不想要邓小平，我们也不想要赵紫阳。虽然他来到广场哭了，但我们觉得他这样做是有动机的。我们反对官员腐败，他的儿子们也腐败……有些人把政府分成很多派：改革派、保守派、新威权派、温和派等……我的看法是，共产党是一个派，害人派……政府中的一些人是好的，但谁是好的谁不是，我不知道。在广场上，我认为改革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改革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改革者和邓小平一个鼻孔出气，穿一条裤子。你上班的时候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你家里的冰箱里有什么？改革带来了危机，改革派比邓小平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你（赵）搞砸了改革，现在你想利用这场运动把责任推给另一群人，不可能。我们反对谁？我们反对你！（受访者 1 号）。

工自联反对改革派的根源在于，恰恰是经济上的不满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而他们的工会主义实际上是在努力保护自己免受他们认为改革者计划的不可预测性和

⁶³ 《告全国同胞书》

⁶⁴ 《告全国同胞书》

麻木不仁的伤害。该组织在5月的政治斗争中不愿区分党内领导的派系，这使他们与参加抗议活动的亲改革知识分子和许多学生疏远，后者试图支持赵的力量，因为很明显，赵试图将自己与邓小平和强硬派区别开来。在学生绝食的一周里，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工自联在一张传单中警告试图利用这次民主运动，达到篡权上台目的的野心家。⁶⁵如果仔细阅读“警告”，它似乎更多的是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不是领导派系。

我们的受访者报告说，从5月中旬开始，工人们就对卷入领导斗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被利用和抛弃保持警惕。他们认为他们的运动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任何领导派别，他们当然不愿意支持被认为是工人折磨者的派系。当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改变对赵紫阳和追随者的态度时，他们也开始失去耐心。

赵紫阳走到广场上落了几滴泪，学生们就来了个大转弯。现在他们说赵紫阳即将被免职，他是个好人，我们应该保卫他。我们当即在广播中宣布，在整场运动中我们从未要求过罢免或者提升任何人。如果您犯了错，则应该向人民承认错误，让普通百姓来评价功过如何。当时，我们认为赵紫阳是来广场糊弄人们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大势已去了。一位工人在我们的民主论坛上宣讲说到，我们可不认为每个会流泪的人都是好人。如果赵紫阳没来，你们现在会做些什么？你们仍然会大呼打倒赵紫阳。李鹏也来广场了，但他可没流眼泪。如果他也挤出来几滴眼泪，你们又会说些什么？（受访者1号）

与学生运动的摩擦

学生对赵紫阳的同情是学生抗议者和工自联工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众多分歧之一。尽管他们在广场上结成联盟，但教育和阶级差异不断阻碍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学生们不是老百姓。他们对其他团体表达经济需求表现出谨慎态度，并希望将运动完全掌握在他们控制之下。这些差异，以及学生内部精英派系斗争日益加深，凸显出政治异议运动中明显的阶级差异：学生理解精英政治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精英，许多人将来可能会成为官员，他们被更加精英化的学生操纵和拉帮结派所吸引是很自然的；然而，对于工自联的工人来说，这是一场令人费解、陌生和充满潜在危险的游戏。学生热衷于派系内斗的情景，点燃了工自联工人们挥之不去的疑问，怀疑学生到底站在哪一边。

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到戒严，学生们都自觉地努力保持自己的“纯洁”。这意味着，实际上，他们将其政治诉求局限于对当局的道德质疑，试图作为“国家的良知”说话，努力维护公共秩序和生产，同时将任何可能破坏其追求的“狭隘”经济和群体利益放在一边。这种对纯洁的追求导致他们早期的做法，手拉着手以防止其他人加入。在占领广场期间，一系列同心圆圈子在物理上表现了对纯洁的追求，这些圈子保护绝食者和高级学生领袖的内圈免受好奇的旁观者和潜在的破坏分子干扰。

⁶⁵ 《告全国同胞书》

工自联的积极分子发现这种排他性令人沮丧，“有些人想过去和学生讨论事情，但在我们说几句话之前，学生纠察队走过来，把我们赶走了。那时，我们不想惹麻烦，也不愿意与学生对抗。”工自联也看到了建筑工人工会受到的同样待遇，该工会在一段时间内驻扎在东观礼台，学生们特别不愿意与他们见面。学生纠察队总是把他们赶走。事实上，很多人对来自村庄的建筑工人有这种态度，说他们是劳改犯（受访者 1 号）。

学生坚持纯洁的最后表现是，他们拒绝让工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内落脚。工人们受到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骚扰，在天安门广场正对面的偏僻地点受到警方的监视和逮捕，他们至少两次在搬迁工作中遭到拒绝。直到 5 月 30 日和 31 日，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和军事行动似乎迫在眉睫，学生们才感到威胁，要让工自联进入广场帮助保护他们。

随着运动的进行，工自联积极分子逐渐感觉到，学生领袖对他们的诉求并无兴趣，反而对他们努力争取权利造成了阻碍。

28 号，工自联曾主张所有的工厂和商店停业。如果不进行罢工，那么工人运动就仍将止步不前。罢工是我们的权利，是用来伸张正义和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有许多单位的工人都支持我们组织罢工；工人们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想接着给他们工作了。但是学生不允许我们罢工，他们尽一切可能来说服我们不要这么做。学生说“这是我们带头的运动，你们必须服从我们的安排。”他们越不让我们这么干，工人们就越觉得难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最终在 28 号之后，我们不再对外主张同情学生们了。（受访者 1 号）。

在这种麻木背后，工自联积极分子也开始感受到学生势利心态的刺痛。

学生总是排斥我们工人，他们觉得我们是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我们曾要求参加与政府的谈判对话，但被学生一口回绝。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工人粗鲁、愚昧、鲁莽且不可理喻，无法沟通。（受访者 1 号）。

当然，在 6 月镇压后，司法机关对待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抗议者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阶级差别。知识分子和学生往往受到较轻的惩罚和较少的身体虐待，而工人可能预期被处决或长期监禁，并在审讯中遭到殴打。不管他们多么被学生们的绝食所感动，工人们觉得他们比大多数学生更可能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而承受更大的风险。

你知道，对于学生来说，这没什么——他们逮捕你几天，就让你滚蛋。但是当我们的工人被捕的时候他们就开枪打我们……政府对我们工人冷酷无情。他们说工人是统治阶级。真是放屁！被捕的工人（6 月 4 日之后）都被殴打半死。我们有个家伙藏了枪，后来他被捕了。公安局把他带回家去取他的枪，几乎认不出来，他的脸被打成浆糊，嘴唇肿得像猪……中途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失败，政府肯定会镇压我们。但我们不能散伙，我们不散政府会镇压我们，如果我们一散政府反而更容易镇压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这里有一群像我们一样的人，有个像我们一样

的组织……学生觉得他们强大无比，而我们工人却能感受到自己时刻受统治秩序支配，一点也不像学生那样自负。（受访者2号）。

随着末日临近，留在广场上的学生终于主动来到工自联总部进行讨论，并开始将他们纳入计划。然而，到6月3日显然已经采取的军事行动之后，他们才跑到工人总部，要求他们举行大罢工。那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工人们先站出来，情况会好很多。学生们不允许我们工人罢工。最后为时已晚，最后叫工人罢工，没有人会同意的。他们会感到受伤，就好像学生们对我们就像对待玩物一样（受访者1号）。

这些摩擦和挫折对工自联组织和政治心态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人们认为他们在学生领袖和运动中观察到了国家领导人及其政治制度的许多缺点：等级制度、保密、对普通民众的傲慢、宗派主义和权力斗争，甚至特权和腐败。工人们以相当有意识的方式开始定义自己的运动来反对长安街对面的这批反面例子。

为了回应学生的排他性，工自联在其章程中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在采访中，成员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领导人会与城市各界人士包括农民自由交谈，畅所欲言，他们广播电台的“民主论坛”对所有听众都开放投稿。为了回应学生的态度：运动是他们的，其他群体要保持清醒，符合学生的宗旨，心甘情愿地为学生运动服务；工自联说在“我们这个由体力和脑力工作者努力建设的国家”，“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工人阶级领导”，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下，去正确领导这场民主爱国运动”中具有“特殊作用”。⁶⁶与学生运动领导人拥有“总司令”、“主席”等头衔的等级制度相反，工人们坚决拒绝授予专门头衔，而宁愿集体领导，赋予人们责任，但既没有特殊头衔，也没有单独命令人们的权利。

工自联没有任何总司令，你要么是会员要么是常委。如果有什么要处理的，我们只是见面讨论一下。我们都只是想完成一些事情，没有人想站出来，从别人中脱颖而出……在五月底一位学生领袖加入我们之后我们非常高兴。但他总是装出要做我们领袖的派头，谁会接受他的命令！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人人平等。虽然我们工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但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受访者2号）

我们的受访者强调，他们的核心领导人对行使权力不感兴趣：他们在工厂里受够了这种事情。一个说，“我们没有那种滥权意识”，另一个说，“我们只会争先恐后地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是争权夺利”。在《工自联临时章程》中，没有提到任何个人领导职位，只提到选举和罢免成员的委员会和制度。（注：临时章程中设立了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职务，由推选产生，其职责为召集和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工人们还认为他们在学生领导中看到了他们在政府中痛恨的那种特权和财务挪用。广场上的工人中广泛传言，学生抗议者中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他们结婚了）不仅拥有最大的帐篷，而且还睡在席梦思的床垫上：帐篷和睡

⁶⁶ 5月21日《工人宣言》5月26日《告海外同胞书》

垫的大小质量根据学生领袖的相对等级分配，许多学生领袖的帐篷里都有电风扇。⁶⁷学生们从普通市民和国外的捐款中获取了巨额资金，并且有传奇故事般的内部斗争来控制这些资金，这令工人们感到厌恶。

我们看到学生因为钱而陷入混乱。他们是资本家：他们拥有的是一大笔钱，而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想因为钱而把事情搞砸，并承担与钱的阴暗交易的责任……我们对学生的财务制度提出了批评。学生们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到今天还不知道。你基本上找不到他们财务部门的人……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两条规则。第一，不接受捐款。第二，如果有人放下钱就走，立即清点，并将使用目的和数量公示（受访者1号）。

与学生领袖们所沉迷的权力斗争、媒体的聚光灯和对财务控制权的混乱竞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自联积极分子们为自己的领导机构中没有持续的权力斗争而感到自豪。与他们认为学生过于知教条说教的语言不同，积极分子们以他们接地气为荣。

我们和学生的区别在于，当我们与城市人民和工人交谈时，我们谈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一个学生问我，你不喜欢更高层次的民主吗？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给我做了一个长篇演讲。我告诉他，别说话了，你说得越多，我越糊涂（受访者1号）。

我们采访的工自联成员一再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干实事”，而不是个人野心或权力斗争，也不是道德化的教条演讲，因为工人阶级的需要是实际的。在我们采访他们时，经常重复的抱怨是，他们“干实事”的愿望一再受到学生主导运动取向的挫败。

很多人走过来对我们说，你的话不是空洞的，当我们听学生讲话时，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学生想要民主、自由、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总是大声疾呼知识分子的地位太低。但他们从来没有提起工人。他们没有回答工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总是在谈论唤醒受苦受难的群众，但普通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需要的是干实事（受访者1号）。

⁶⁷ 我们未能确认或宣布这些“事实”是否真的属实，但是，我们检验工人政治心态的要点是，这些信念是存在的，这些工人也有可能展示出他们自己运动的理想化画面，同样，感知，而不是事实，是这里的关键。

结论

先前所说北京市工人联合会组织运动的程度受限，这绝非错误。的确，工自联是学生示威和占领广场造成的政治瘫痪的产物。其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在走上街头之前并不相识。该组织从未在工作场所设立分支机构，因此无法在关键时刻协调工厂的罢工。然而，考虑到学生领袖们缺乏同情心，以及他们一再试图控制工会运动，这群持不同政见的工人在几周内能走这么远，是了不起的。5月中旬作出决定后，工自联组织迅速联合起来。它得到了该市工人的大量物质和道义支持，并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调集大量资源。工人运动在宣布戒严后增长最快，正是在学生运动开始消散，并在事件中起不那么决定性的作用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无疑使那些赞成暴力镇压的官员大为震惊。尽管广场上的学生和公民人数迅速减少，但6月4日发动的军事行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些官员对工人叛乱的致命恐惧。

然而，最重要的是该组织的民粹主义心态。工自联从未尝试过玩道德姿态的精英游戏。它并没有试图偏向任何受青睐的派别影响党内权力斗争，工自联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在工人的估计中，改革派及其知识分子都只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所有的精英都享有特权；他们都没有考虑到工人的利益。尽管学生与官僚斗争，工人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但工人们发现，学生们对普通民众表现出同样的漠不关心和傲慢，与党的领导人一样追求权力和特权。与文革期间某些群体激进主义一样，工自联是极其反精英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然而，1989年工人的民粹主义言论与新的政治概念混合在一起；在工会代表制和集体谈判的框架内，对工作场所管理权力实行体制性限制，更隐约的是，独立工会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以及“监督”共产党行使权力的制度化权利。

从工自联的短暂历史中得出的一个明显的道德观是，除非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劳动人民之间的这种明显的障碍隔阂被打破，否则未来的民主运动都将是跛脚鸭。但是，更重要的是，工自联强调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明显疏漏——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持不同政见者，都必须考虑，民主运动应如何大规模动员普通公民，广大工人应如何融入这种运动和他们寻求的新秩序？中国传统“民主”思想中存在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这种思想质疑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可行性。⁶⁸这种倾向性无疑会由于工自联在运动中公开表现出蔑视知识分子权威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取向而继续强化。如果说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道路是渐进式改革的话，那工自联则暗示了80年代中国改革思想的一个缺陷。尽管经济强劲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但工人似乎正在走向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积极和潜在的破坏性作用。1989年短暂浮出水面就被淹没的工人阶级民粹主义将持续下去，只要改革政治家和他们的知识顾问继续局限在只有通过物质奖惩和失业威胁来激励工人的方法，同时继续忽视工人日益渴望在工作场所和国家中被视为正式公民的话。

⁶⁸ 伊丽莎白·佩里在她的文章中也提出了关于参加抗议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心态的同样论点，见她的《知识分子与天安门：流产革命的历史视角》《列宁主义危机与左派衰落：1989年的革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1991年），第129-146页。

香港

1992 年 6 月 4 日

* 我们感谢 Anita Chan, Elizabeth Perry 和 Jonathan Unger 对先前草案的评论, 以及哈佛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讨会的与会者, 这些研讨会的草稿是口头提交的。魏昂德还希望感谢他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赠款 BNS-8700864 下获得的支持, 当时他是 1990-91 年加州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本文的初稿是 1990 年秋天在那里编写的。